

周作人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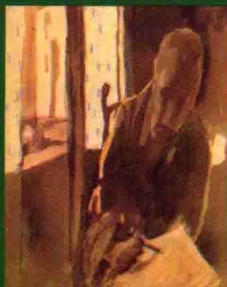
錢理群 著

開拓者的足跡 ✧ 周作人與同時代人

藝

文

類



周作人論

錢理群 著

周作人論

作者◎錢理群

發行人／林維青

出版發行／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4914號

台北市南京東路3段269巷6號B1

(02)5451438

郵政劃撥／1580676-5

訂書專線／7192088

傳真機／9172087

排版／辰皓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刷／海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1994年1月

定價／260元

I S B N / 957-669-461-2

目 錄

代序 「周作人道路」及其意義	1
上篇：開拓者的足跡	25
第1章 周作人及其同代人的知識結構	27
第2章 兩大文化撞擊中的選擇與歸宿	39
第3章 性心理研究與自然人性的追求	51
第4章 兒童學、童話、神話學研究與傳統文化的反思	81
第5章 民俗學研究與對國民性的考察	101
第6章 散文藝術	133
第7章 文藝批評	151
第8章 翻譯理論與實踐	165
第9章 論文學語言的變革	181
第10章 對現代小說、散文理論的歷史貢獻	199
第11章 周作人與五四詩歌藝術思維的變遷	211

下篇：周作人與同時代人	220
第12章 周作人與章太炎	223
第13章 周作人與蔡元培	235
第14章 周作人與李大釗	247
第15章 周作人與陳獨秀	259
第16章 周作人與胡適	277
第17章 周作人與錢玄同、劉半農	291
第18章 周作人與文研會、創造社同人	309
第19章 周作人與現代評論派、新月派諸君子	333
第20章 周作人與湖畔詩人	347
第21章 周作人與俞平伯、廢名	355

代序

「周作人道路」及其意義

二十世紀是以「亞洲的覺醒」為其開端的。被稱為長期完全停滯國家之典型的中國之覺醒，無疑在「亞洲的覺醒」中佔據特殊重要的地位；中華民族的崛起，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歷史事件之一。

東方巨人中國沉睡的時間是過於長久了。但誰會料到，這個幾乎已經「老化」了的民族，竟然蘊藏著那麼巨大的生命力呢？本世紀初，她剛剛從中世紀的停滯狀態中覺醒過來，短短的幾十年間，就以風馳電掣般的速度，走完了歐洲幾個世紀才走完的思想歷程。這一往無前的民族進取精神在本世紀內一再使舉世為之震動。但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古老的國家之一，傳統思想的枷鎖比任何國家都更沉重。每前進一步，都要與歷史的惰力進行搏鬥。時代發展的道路竟是如此之艱難與曲折，也為舉世所罕見。歷史跨入二十世紀以後，中華民族覺醒的進程，始終交織著前進與倒退，突變與停滯，苦悶與追求，徬徨與抉擇，充滿了飽含血淚的痛苦，也有著巨大的歡樂。在這歷史的起伏中，造就了一大批新

的知識分子。其最有典型意義的代表，就是周作人。

周作人曾經背叛封建士大夫階級，成爲人道主義、自由主義的啓蒙思想家；但他漸漸遠離時代潮流，漠視民族的奮起，反對人民的鬥爭，雖幾經掙扎，仍不能衝破封建傳統思想的羅網，並淪爲帝國主義的附庸。周作人的道路，以悲喜劇的色彩，表現了中華民族覺醒過程中的全部複雜性與曲折性。周作人從時代前進的動力蛻變爲阻力的歷史，對於二十世紀中華民族覺醒的歷史，無疑是一個極爲深刻的題目。它所包含的豐富歷史內容對於不斷在歷史反省中前進的中華民族是一個寶貴財富。

—

我們的分析從一九〇七年周作人在《河南》發表《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時論文之失》開始，乃是因爲在這之前，周作人總的說來還是處於學習階段——和當時多數「新派」青年知識分子一樣，先是受嚴復、梁啓超、林琴南的影響，接受了西方新思想、新文學的啓蒙教育，以後又在革命派與改良派的大論戰中，轉向章太炎。從發表《論文章之意義……》開始，周作人以獨立姿態出現於中國思想文化界，發出了自己的聲音。

早在上一世紀末葉，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大炮就轟開了古老中國的大門。中國從「宇宙之中心」的幻夢中醒來，發現自己遠遠落後於西方。嚴重的民族危機感引起整個民族（通過自己的先進分子）進行嚴肅的反省：西方強盛、中國落後的原因是什麼？什麼是根本的民族復興之道？——現在關懷著民族命運的周作人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有兩個現成的答案，或以爲西方強盛在於「物質文明」，遂「競言武事」，熱衷於「製造商估」；或以爲西方強盛在於「社會民主政治」，「以衆治爲文明」，而熱心於

「立憲國會之說」^①。周作人在《論文章之意義……》中，卻力排衆議，明確提出：「文章或革，思想得舒，國民精神進於美大，此未來之翼也」，將「思想」的自由與解放，「國民精神」的改造與發揚，視爲民族「未來」希望之所在；而在他看來，其關鍵又在於「文章」即文學藝術的根本變革。這樣，周作人就將文學藝術與二十世紀中國的根本問題——民族的振興連結起來，以文學藝術的變革爲拯救民族危亡的開端與根本。人們正是從這裏聽到了二十世紀中國現代文學最初的歷史聲音。

周作人不僅熱衷於民族的振興，更關心「人性」的全面發展。在《論文章之意義……》中，周作人肯定「人生之始，首在求生」，因此，「衣服飲食居住之需，爲生活必須」；但周作人更認爲人畢竟不同於動物，他於「求生意志」之外，還要求「天賦之性靈」的自由發展。在周作人看來，所謂人的解放、人生的全部發展，包括物質的生存欲望的滿足及精神的自由發展兩個方面，而後者是更爲重要的。

這樣，從「人的精神自由發展」的要求出發，周作人對禁錮思想自由的封建帝王專制統治及儒學思想專制進行了極爲猛烈的攻擊。周作人將孔子儒學與封建專制統治聯繫起來進來考察，指出：在中國，孔子儒學已成爲「帝王之教」；「蓋孔子定經而後，遂束思想爲一縛」，「夭闕國民思想之春華，陰以爲帝王之右助。推其後禍，猶秦火也」。他的結論是：「吾國……獨亞於他國而希更始之機者，正以惟吾國有孔子故」。他大聲疾呼，欲思想解放必「擯儒者於門外」。——這已經是五四「打倒孔家店」的先聲了。但另一方面，當周作人鼓吹「一書之力，恒足以左右人間。……斯妥夫人《湯姆之小舍》書出，致興南北美之戰，而黑奴終解」^②，進而將倫理的改造、人性的改造（包括國民

性的改造)置於解決中國問題的中心位置，這就導致了「誇大主觀精神力量」的歷史錯誤。這裏根本的原因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現實物質力量過於薄弱，使人們不能不到主觀精神那裏去尋找力量，有意無意地把人的主觀能動作用膨脹為「脫離了物質，脫離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絕對。」^③正是這一點，構成了周作人早期思想的根本弱點，並且預伏著以後思想發展的內在矛盾。

二

儘管早在本世紀初，周作人已經顯示出思想的獨創性與深刻性，但是，歷史條件的不成熟，迫使他不得不沉默了將近十個年頭。直到標誌著中華民族覺醒新階段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才給他及其同時代人提供了一個創造歷史的機會。

在同樣的歷史機會面前，能夠在多大程度上發揮歷史作用，取決於對歷史提出的任務的認識深度。一九一九年初，周作人在一篇題為《思想革命》的文章中，明確提出中國所需要的「文學革命」應該包括「文字改革」與「思想改革」兩個部分，「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卻比第一步更為重要」。他警告說：「我們不可對文字一方面過於樂觀，閑卻了(思想)這一方面的重大問題」。正是因為始終沒有進行過比較徹底的反封建思想革命，在中國近代史上，出現了一次又一次「換牌不換貨」的悲劇。周作人自覺地意識到並且提出了這個關係著中國革命前途的歷史課題，從而抓住了在促進民族覺醒鬥爭中具有決定意義的一環，這就奠定了他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以至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反封建的啓蒙思想家」的歷史地位。

周作人曾經說過：「堅持民族主義有十年之久」，之後，「五四時代我正夢想著世界主義」^④。正是著眼於世界文學的發

展，周作人建造起了他的人本位主義的文藝觀體系。按照周作人自己的解釋，這種文藝觀有兩根理論支柱：「一、這文學是人性的，不是獸性的，也不是神性的」^⑤。周作人發展了日本留學時期「人性全面發展」的觀點，首先強調「人的一切生物本能，都是善的美的」^⑥，要求文學衝破封建禁慾主義的禁錮，大膽表現人的本能衝動、情欲和人的獸性方面，宣揚人的自然慾望的合道德性，同時又強調「人」作為「進化的動物」，它有高於一般動物的精神的要求，這就是「人」的「神性」方面。「獸性與神性，合起來便是人性」。周作人據此而要求文學從「獸性」與「神性」、「肉」與「靈」的統一中去表現「人」；不儘表現人的生物慾望，而且表現人精神世界的「內面生活」^⑦。周作人的人本位主義文學觀的第二根理論支柱是強調「文學是人類的，也是個人的；卻不是種族的，國家的，鄉土及家族的」^⑧。按照周作人的觀點，文學經過了「人類的文學」、「階級的文學」的初級階段，進入了「個人的文學」的階段，所要表現的是排斥了人對社會、階級、民族責任的純粹的個人價值。周作人所提出的人本主義文藝觀基本上是歐洲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思想的中國再發現。歷史的無情安排使中國比之亞歐各國落後幾個世紀，當西歐已由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時代，中國依然面臨反封建的任務。因此，「西歐已成重新估定價值的問題，中國卻還很新鮮」^⑨。在這樣的具體歷史條件下，人性論抽象的理論形式包蘊著反封建舊傳統、舊禮教、舊道德、舊文學具體歷史階段內容；周作人的人本位主義文藝觀其主要矛頭是指向封建禁慾主義，封建舊制度、舊禮教對於人的個性的壓抑，及宣揚這種封建道德觀念的封建文學（周作人把它斥為「非人的文學」）。因此，周作人在五四時期所提出的「人的文學」的口號，在當時產生了極大影響，成為

「五四」文學革命重要的理論旗幟之一，並且對促進五四時期「人的自覺」、民族的覺醒，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五四新文化運動發生時，世界資本主義的各種弊病已經充分暴露，在十月革命影響下，「社會主義」成爲世界性思想潮流。因此，五四時期的中國知識分子幾乎是天然地對於社會主義表示同情，一時「社會主義」成了一種口頭禪。敏感的周作人正是五四時期鼓動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到處演講、著文，提倡「新村主義」，鼓吹「平民文學」，並且是「工讀互助團」發起人之一。周作人的出發點依然是在日本時期已經提出的「人的全面發展」的思想。他說：「新村的理想，簡單的一句話，就是人的生活」：物質方面「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精神方面，則是「自由發展」^⑩。他又鼓吹以勞動作爲人「在自己發展上的必要手段」，強調在「手的工作」與「腦的工作」的結合中獲得人的協調發展^⑪。恩格斯說過：「就其理論形式來說，現代社會主義開始時表現出總是十八世紀法國偉大啓蒙學者們所提出的諸原則之往前的、表面更爲一貫的發展」^⑫。周作人就是這樣對法國啓蒙學者的人道主義思想作了新的解釋，表現出某種空想社會主義的傾向。

但就在周作人關於新村運動的「激進」宣傳裏，仍然隱隱流露出內心深處的矛盾。他滿懷「憂慮」的心情，表示擔心人民革命的勝利，會「藉口大同，壓迫特殊的文化思想」，「帶來扼殺人的個性」的「新式的專制」^⑬，因此，他希望通過新村運動的宣傳與實踐，平和造成新的秩序，「以免將來革命。」^⑭而周作人關於新村運動的設想裏，又揭示了他靈魂深處封建隱逸的銹斑。儘管在五四革命高潮中周作人主觀上並無隱逸的要求，但客觀潛伏著的隱逸氣習在另一種政治形勢下就必然要頑強地表現出

來。周作人這位五四時期反封建的驍將，對於封建主義一切外在表現形式是那樣敏感，批判中充滿了機智，但對滲透在自己靈魂深處的封建主義的陰魂卻深然不覺，表現出極大的盲目性。這個事實正是說明了封建主義傳統思想對於中國知識分子（包括其中的先進分子）毒害之深。這又為以後周作人思想的「轉變」埋下了伏筆。

三

「五四」新文化運動高潮過去以後，中國思想文化界進入了一個在苦悶中反思、求索的時期。

首先提出的是「思想文化（包括文學）的作用」的問題，這又是與知識分子道路問題的探索聯繫在一起。周作人總結現實的經驗，得出了「教訓無用」的結論。他反覆申論說，「思想的力量在群眾上面真可憐地微弱」¹⁵，一切思想的宣傳、運動至多「有言行流傳」，「至於期望他們教訓的實現，有如枕邊摸索好夢，不免近於癡人」¹⁶。周作人直到晚年仍認為這是「迷妄」裏的「覺醒」¹⁷，但這「覺醒」的實際意義卻是複雜的。離開了物質的基礎，妄圖單純依靠思想的宣傳、文學的啓蒙來改變人民群眾的精神面貌，這種誇大思想啓蒙作用的迷信無疑是應該破除的，但周作人卻由此根本否定了群眾覺醒的可能性和思想啓蒙的作用與意義，就又陷入了虛無主義的「迷妄」。這種根植於對大多數人民群眾深刻的不信任感¹⁸的虛無主義新結論，是周作人以後一系列理論倒退的出發點。他由此而根本否定新文學與人民群眾結合的可能性，認為大眾只能欣賞「改良」的「舊劇」，「完全擺脫舊傳統」的新文藝「享受者總限於少數」，「新的藝術決不能克服群眾，這是永遠的事實」¹⁹。對文學的思想教育作用與社會

意義的追求，同樣成了毫無意義的「虛妄」。周作人公開宣稱：「有益社會」並非「著者的義務」²⁰，割斷了與人民、時代、社會的聯繫，文學就成了純粹個人的玩物。周作人直言不諱地宣布「文藝只是自己的表現」²¹，文學的作用僅僅在於使自己得到滿足。這樣，周作人終於失去了作為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現代作家最可寶貴的品格——對於時代、國家、民族與人民的使命感與責任感，鑽進了藝術的象牙塔。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背棄了他自己一如前所述，在本世紀初及五四時期，周作人本人也是新文學與新文化戰鬥傳統的重要開始者之一。這對周作人當然不只是一個文學觀念的轉變，而是人生態度與道路的一個轉折，他由此逐漸走上（當然不無痛苦、猶豫）遠離時代主潮、漠視民族奮起的道路。這是一個危險的斜坡的開端；歷史將無情地顯示，沿著這個斜坡會滑到哪裏去。

當周作人自覺地回到自身，就著手於建立自己的思想體系。五四時期周作人接受了西方長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形態的人道主義的影響，因此，既有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改良主義，也有空想社會主義，是一個雜貨舖。現在他根據五四以後形勢的發展，作了適當的調整：摒棄了五四時期人道主義思想中最激進的部分——空想社會主義，其他方面則繼續保留與發展，逐漸形成了以要求「思想文化的自由、多元發展」、「對異己思想的寬容」、「保護少數」等為核心內容的一整套自由主義思想！這是周作人建立自己思想體系的努力所獲得的最初成果。

由於在現實生活中，對思想自由發展的主要威脅，來自帝國主義、封建軍閥政府，因此，周作人在女師大風潮、五卅運動、三一八慘案這一系列重大政治思想紛爭中，都旗幟鮮明地站在進步營壘一邊。周作人還以極大努力與各種形式的封建復辟倒退傾

向進行鬥爭。而更見周作人個人特色的，還是他對五四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的戰鬥方向的堅持：他繼續猛烈批判封建禁慾主義，提倡新的兩性道德，和以兒童為本位的新道德觀²²。在這些方面，他很打了幾次大仗，產生了極大影響。周作人畢竟是五四時代反對建的老將，儘管如前所述，他已在理論上得出了「教訓無用」的結論，他在事實上卻並沒有消極，仍然堅守在五四以後反封建思想鬥爭的第一線上。

但毋庸諱言，周作人的自由主義思想刀刃的另一面，又是指向馬克思主義、革命群眾運動與革命專政思想的。這樣，在現實鬥爭中，周作人不能不經常陷於左右夾攻的苦境之中。這幾乎是一切企圖走第三條路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共同命運。處於這樣的苦境中，隱藏在周作人思想深處的封建士大夫鬼魂像瓶中惡魔一樣乘隙而出。一九二三年，周作人寫了一篇題為《尋路的人》的文章，聲稱人生之「路的終止是死，我們便掙扎著往那裏走」。在周作人看來，在這無可逃避的命運面前，一切努力奮鬥都是徒勞的，唯有樂天知命，順其自然，「盡量的享受」，以求得個人剎那間的滿足。就在這虛無悲觀情緒支配下，周作人「不禁神往於焚香靜坐的安閑而豐腴」的生活和情趣²³，把「隱逸」作為脫離思想困境的「唯一的路」²⁴。正是周作人在一九二四年提出要「復興千年前的舊文明」的口號²⁵，呼喚著原始的「禮」與「中庸」的復活，以為「捨此中國別無得救之道」²⁶。在本世紀初，周作人曾振臂高呼「摒儒者於門外」，現在又要恭恭敬敬請回孔孟的尊神。這種自身思想上的「封建復辟」與上述對社會上復辟傾向的批判幾乎是同時發生的，這充分顯示出周作人這類過渡時期知識分子思想的複雜性。周作人一再申說的所謂「叛徒」與「隱士」兩個鬼的搏鬥，正是反映了周作人對封建傳統既

反對又留戀的矛盾心境。這個矛盾只有靠實踐來解決。正是一九二五、二六年的革命高潮把周作人捲入革命的洪流，「叛徒」鬼終於佔了上風。這說明，一九二三、二四年間短暫的封建思想「復辟」僅僅是周作人思想發展過程中的一段曲折，不能改變周作人這一時期總的進步傾向。它是五四時期潛伏著的隱逸思想的一次爆發，又預伏著三十年代中後期思想全面沒落的危機。

四

當歷史進入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經過一段徬徨、苦悶，周作人終於宣布自己「由信仰而歸於懷疑，這是我的『轉變方向』了。」²⁷轉向那裏呢？周作人提出了著名的「閉門讀書論」，鼓吹到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精神出路。對於周作人自身來說，這一轉變是帶有根本性的。如果說本世紀初周作人（及其同代人）努力地掙脫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羈絆，向西方尋找民族自強與自我解放的道路，現在，周作人卻自動地回到中國傳統文化的懷抱，而且不再懷有任何救國濟世的目的，僅僅是爲了自身「得體地活著」²⁸。「得體地活著」，成了周作人後半生全部生活目標與意識中心。

人的生物性的生存本能被提煉爲一種「活著就是一切」的人生哲學。但作爲有教養的知識分子，周作人當然不會滿足於純動物的好死賴活般的「活著」，而要活得「得體」，首先就是要在「道德的自我完善中求得心理的平衡」。這是周作人一貫追求的：每逢歷史轉折點，思想、感情發生激烈矛盾、衝突時，他總是後退一步，迅速尋找一個新的妥協點，來求得內心的平衡與安寧。中國傳統文化正是長於心理平衡，魯迅說：「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現實人生離開」²⁹，魯迅因此而規勸青年「不

讀或少讀中國書」；周作人現在恰恰要「沈靜下去，與現實人生離開」，一頭鑽進中國書裏去「避難」了³⁰。

他首先需要解決的是「出世」與「入世」的矛盾。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古老的、近乎「永恆」的矛盾，對於周作人似乎更為尖銳。他一再不無痛苦地訴說：「中國是我的本國，是我歌於斯哭於斯的地方」³¹，曾經有過許多「期待」，總「不肯消極，不肯逃避規定，不肯心死」³²。周作人畢竟是中國現代新文化傳統的開創人之一，要完全熄滅在年輕時就點燃起的愛國主義、理想主義的火焰，談何容易。內心情感、心緒在「有暇而無閑」³³與「心閑故無礙」³⁴之間波動起伏，周作人苦苦地在儒家與道家乃至法家之間尋求共同點，終於有了新的「發現」：「道、儒、法三家原只是一氣化三清，是一個人可能有的三樣態度，……卻不是絕對對立的門戶」，「道家是消極的徹底」，「法家則積極的徹底」，孔氏之儒則在法、道之間「彌縫」³⁵。他進一步解釋說，中國道家所主張的隱逸，不同於西方「宗教的」隱逸，「是社會與政治的」，即仍然懷有自己政治與社會的理想及對現實的不滿，精神實質「並不消極」。這就與儒家有了相通之處：「二者還是一個源流，因為都知道不可，不過一個還要為，一個不想再為罷了」；隱逸之士為「苟全性命於亂世」不得不退遁於世，自然有說不出的苦味，儒家就是在「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而拼命向前的時候，也掩藏不住濃重的「悲涼之氣」³⁶。這表明，在中國傳統中，「出世」與「入世」之間並無嚴格的界限，兩者互相滲透，互為補充。這樣，周作人所面臨的「入世」則無能為力、心有所懼，「出世」則不肯甘心、心所不願的矛盾，就找到了一個中庸的解決法：以入世的精神出世，或以出世的精神入世，既入世又非入世，既出世又非出世。總體上躲在

苦雨齋裏過著逃避現實的隱逸生活，彷彿不食人間烟火，偶而又從苦雨齋裏伸出頭來，看看人間，發幾句牢騷，彷彿仍是世間人。你說他逃避現實嗎？他關心著世事，你說他熱衷於仕途嗎？他又悟徹一切；不過處處順其自然，想談風說月就談風說月，願呵佛罵祖就呵佛罵祖。談風說月自然心平氣順，呵佛罵祖，出口鳥氣，氣順自然心平：各有各的妙用。調和出世與入世的中庸之道對於周作人正是這樣自欺欺人的撫慰劑，它起著類似宗教的心理平衡作用，為周作人逃避現實、背離五四傳統的行徑提供心理的解脫。

周作人在儒家的「入世」與道家的「出世」之間尋求微妙的平衡，由激烈衝突達到了調和靜穆，顯示了周作人後期思想以至文風特點；周作人自己曾把它概括為「於雜糅間見調和」³⁷。他一再宣稱自己不是任何文化系統、學派的「信徒」，他追求的是以「愛智者」³⁸的身份，對各種互相矛盾對立的思想學說一律採取「寬容」的態度，盡力從中尋找共同點，以便把它們調和起來，兼收而並蓄。周作人所強調的「一律寬容」自然是不可能徹底實現的，但他在考察西方文化、日本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以及中國傳統文化中儒、法、道各學派之間關係時，確實著眼於它們之間的互相契合處，他反覆強調，作為西方文化淵源之一的希臘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很有點相像」³⁹，「西哲如藹理斯等的思想實在與李（贛）兪（樾）諸君還是一鼻孔著出氣的」⁴⁰，日本與中國有著共同的「東洋人的悲哀」⁴¹；他一再推崇的中國文人大都有思想通達、兼收各派學說的特點，如顏子推的思想「寬大」而「雜」⁴²，傅山「於儒道佛三者都能通達，故無偏執處」⁴³等等。周作人的著眼點更在外來思想、傳統思想與自己思想、個性的契合。一方面，他把自己的個性投影於中外思想